



《西藏视点丛书》

# 清王朝与西藏

赵志忠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王朝与西藏/赵志忠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10

(西藏视点丛书)

ISBN 978 - 7 - 5075 - 0915 - 1

I. 清… II. 赵… III. 地方史 - 西藏 - 清代 - 史料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30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cs@263.net

电话 010 - 63370152 63370164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10.5 印张 149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6001 - 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 再版序言

华文出版社于2000年首版《西藏视点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为适应读者群，特别是藏学爱好者和工作者的需要，现在又对这套丛书进行再版。

丛书中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是西藏刚和平解放时就进藏工作的牙含章先生的力作，以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以来的历史为经，以达赖、班禅两个世系历代活佛的主要活动为纬，织成了一幅西藏六百多年历史的画卷。这两本书作为早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学术专著，曾对几代藏学研究者和涉藏实际工作者产生启蒙的作用，至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蔡志纯与黄颢合著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比较系统、扼要地介绍了活佛转世的由来及转世全过程、新转世活佛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央政府对转世活佛寻访认定的管理和对大活佛的册封等等。活佛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有现象，对西藏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曾具有关键性影响，至今这种影响力仍不可忽视。无论是从西藏的发展与稳定工作角度看，还是从藏学研究的角度看，活佛转世问题都是一个必须重视、必须搞懂的问题。赵志忠的《清王朝与西藏》将满学与藏学相结合，详细论述了清朝对西藏长达二百多年的有效治理，记述了清朝的西藏政策、这一时期西藏的重大事件以及达赖、班禅进京觐见皇帝等重大历史活动，不仅以丰富的史实说明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也为今天涉藏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这四本书分别出自不同时期我国学者之手，各有特点，自成体系，同时又互相映衬，可以视为研究西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基础性读物。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藏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高度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促使藏学研究更加生机勃勃、繁荣兴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科院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以及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国

藏学科研人员逐年增长到 3000 多名,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基本形成了系统的学科框架,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趋活跃。这些不仅使藏学在短短二十多年间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门“显学”,也为藏学今后更大的发展打下了雄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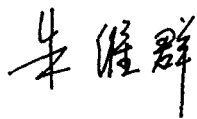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加强藏学研究,对于人们从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面上理解国家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对于促进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对于世界上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西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藏学工作者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西藏一样,都面临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好机遇。

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早在 17、18 世纪,外国殖民势力觊觎西藏,从不同方向派遣人员进藏刺探情报,其中一些人也就开始研究西藏,以“藏学家”自居。为殖民主义服务是出不了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果的,直到今天,国际上还有一些势力或挖空心思地歪曲历史,炮制所谓“西藏独立”的依据,或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以学术为幌子,攻击我们国家的西藏政策。这就使我国藏学研究域不能不成为学术领域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前沿,我国藏学工作者不能不直接面对维护民族利益的责任。多年来,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拿出了一大批兼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理论学术水平的成果,使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一扫阴霾,透出些许生气。但是战斗未有穷期,我们还要在已有基础上,深入研究,还西藏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谬论,自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这是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藏学工作者光荣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作出了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决策,需要藏学研究从各个领域予以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同时也为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藏学工作者要始终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把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同西藏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服务的能力。只有这样,藏学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广阔的舞台。

藏学是一门富有民族(藏族)和地域(藏区)特色的学科,领域广阔,门类

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藏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囿于狭小领域。时代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接着画地为牢,不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贴近社会的发展变化,关注藏族群众现实的生产生活,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西藏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吸收、运用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推进藏学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有着取之不尽的藏学资源,新时代的新生活又为藏学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藏学研究的领导和协调,统筹研究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整体优势,使藏学在其故乡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朱俊群'.

2006年6月13日

## 序

西藏之隶属于祖国版舆尚矣。早在唐代，中原王朝即与吐蕃政权建立了亲密关系。元、明、清三代王朝都对西藏进行了有效的直接统治。

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一代封建王朝，其在处理民族关系、民族矛盾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通过对喇嘛教的支持，对达赖、班禅等上层宗教人士的封号，以及“金奔巴瓶”制度的确立，将西藏的宗教事务处理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使得西藏政务由中央王朝派人直接管理。清代初年，为了西藏的安定，清王朝曾多次出兵西藏，清除不安定因素，反对外来侵略，从而更有力地控制了西藏。历史证明，清王朝的一系列治藏政策和举措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也可以说，清王朝实现了有史以来对西藏最有效、最彻底、最完全的统治，并且长达二百年之久。

清王朝与西藏地方这一研究课题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它既属于清史、满族史的研究范围，又属于藏学的研究范围，只不过是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罢了。搞历史的人似乎更侧重于清王朝对西藏的政治统治，侧重于研究驻藏大臣的设立、西藏地方经济、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等；搞藏学的人似乎对清王朝的宗教政策，达赖、班禅的册封以及他们的内地之行更感兴趣。清王朝与西藏这一课题，目前研究得还很不够。特别是从一代王朝对西藏地方的全面统治角度，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论述；将清史、满族史研究与藏学研究相结合，更是少见。

现在，赵志忠君所著《清王朝与西藏》一书即将出版，实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赵君是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系副教授，也是满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及满学研究。曾经出版过《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满族民间文学概论》、《〈满谜〉研究》、《北京的王府与文化》等著作，并有《满族与佛教》、《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等几十篇论文。

《清王朝与西藏》一书是从满学与藏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其选题新颖、材料丰富,值得肯定,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赵君通满文,并应用了大量的藏文、汉文史料,使此课题研究更有新意。

《清王朝与西藏》一书分别论述了清王朝的西藏政策、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出兵西藏的始末、“金奔巴瓶”制度的设立、达赖、班禅的北京之行等问题。虽说不上全面与深入,但也是一新的探索,为今后深入研究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本书行将出版,问序于我,爰为之略抒所见如上。是为序。

王钟翰

1999年5月撰于中央民族大学





- 第二节 六世班禅承德之行/67
- 第三节 十三世达赖北京之行/74

## 第五章 进驻西藏 管理西藏:清王朝驻藏大臣的设置/80

- 第一节 驻藏大臣设置始末/80
- 第二节 驻藏大臣衙门/84
- 第三节 驻藏大臣事迹/87

## 第六章 维护统一 维护统治:清王朝出兵西藏/96

- 第一节 康熙朝驱除准噶尔之战/96
- 第二节 雍正朝平定西藏内乱/99
- 第三节 乾隆朝击退廓尔喀之入侵/100
- 第四节 出兵西藏的历史意义/105

## 第七章 民族和睦 共建家园: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108

- 第一节 清代汉藏关系/108
- 第二节 清代蒙藏关系/112
- 第三节 清代满藏关系/117

## 第八章 国家一统 雪域繁荣:清王朝统治西藏的历史功绩/129

- 第一节 中国版图的最后确定/129
-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132
- 第三节 西藏地区的百年安定/137

## 参考书目/142

- 附表:一、清代皇帝一览表/144
- 二、历世达赖、班禅一览表/145
- 三、清代历任藏王、摄政一览表/146
- 四、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147

## 后记/155



# 第一章 绪 论

西藏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早在唐代,中原王朝就与西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揭开了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序幕。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管辖全藏地区事务衙门——宣政院,并分封了十三个万户侯,对西藏实行全面治理。明朝时期,除了沿用元代制度外,还分封了众多的宗教之王,让他们分别管理西藏地方僧俗事务。清王朝时期,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的重要时期。达赖、班禅的册封,驻藏大臣的派遣,国家军队的长期驻扎,大喇嘛转世制度的制定以及经济、货币体系的确立等,都是其他王朝所不及的。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西藏安定、繁荣,成为西藏历史上的好时期。

## 第一节 元明王朝与西藏的关系

公元1234年,元朝灭金,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在位。窝阔台之子阔端奉命进攻西南,并于1240年由蒙古将军多达率兵进入藏地,其先头部队已达距拉萨不远的热振寺。1246年,应阔端之召萨迦班智达袞噶坚赞掌管萨迦寺事务,并带两个侄儿八思巴、洽那,前往凉州与阔端会晤。此次会晤是元王朝与西藏地方上层的直接接触。

1260年,忽必烈继承皇位,改元中统,并封八思巴为国师。这时的八思巴已经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忽必烈一家信仰佛教的启蒙者。国师的职权在于总理天下释教,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一,说明蒙古族上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佛教,并且开始重视佛教。其二,封藏人八思巴为国师,确立其宗教领袖的地位,也是对西藏僧俗统治的需要,说明西藏已经被元帝国所统治,成为元帝国的一部分。

1269年,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创造了新蒙古文“八思巴文”。为了表彰



八思巴，忽必烈将整个吐蕃三区赐给八思巴，并加封为“帝师”——帝王之师。帝师奉皇帝圣旨可以向西藏各个寺院发布文告，可以向皇帝推荐藏区的主要官员。

1276年，八思巴回到故乡萨迦，并推荐贡噶桑波为新本钦。1208年八思巴暴死于萨迦寺，终年只有46岁。由于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合，元朝第二年出兵十万进入西藏，并杀死了贡噶桑波。

元朝总管西藏事务的机构称“宣政院”。宣政院的前身为“总制院”，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专门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又称释教总制院，主要用来管理佛教事务。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宣政院归帝师统辖，并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在藏族地区受中央任命的最大官吏为宣慰使，其机构名称为“宣慰使司”或“宣慰司”，兼理军政要务者称其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使由帝师或宣政院推举，由中央任免。元代，藏族地区分别设有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今甘肃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四川西北一部分，统由“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今四川西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昌都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统由“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今西藏自治区地方，由“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sup>[1]</sup>

元代在西藏地区还设有“十三万户”。万户一职是由中央认可并受封的地方势力集团。据一些藏文史料记载，十三万户为前藏六个、后藏六个、前藏与后藏之间的羊卓一个。<sup>[2]</sup>这些个万户也统归“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改元为洪武。大约到洪武八年（1375年），整个藏区接受了明中央王朝的政令，确定了辖属关系。明王朝对藏政策基本上沿袭了元朝制度。除将三个“宣慰司都元帅府”改为“乌斯藏卫指挥使司”和“朵甘卫指挥使司”外，其他行政机构和官员都转到了新政权之下。

在宗教上，明王朝取消了“帝师”一职，赐给僧人以“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等称号。为了体现西藏政教合一的特殊制度，从永乐皇帝起又在灌顶国师之后加上“王”。永乐四年（1406年），封札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之后，又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及“思达藏辅教王”、“必力工瓦阐化王”等。永乐五年（1407年），封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之名号。这个“大宝法王”实际上就相当于元代的帝师，为藏传佛教在明代的最高职位。之后，又封萨迦派僧人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



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之名号，成为仅次于“大宝法王”的又一佛教领袖。

明朝初期，新的教派格鲁派在西藏兴起。永乐帝派人请创始人宗喀巴进京晋见。宗喀巴因年高辞谢，只派其弟子释迦也失到京。永乐帝先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名号，后再次赴京被封为“至善大慈法王”。明朝规定的僧人等级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共为七等。

明王朝所封诸王，都兼有大国师之名号，是政教合一制度的具体体现。在中央王朝的领导下，西藏内部事务均自治管理，二百多年间比较安定。

## 第二节 清王朝与西藏的关系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在总结、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对西藏的特殊政策。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西藏进行了二百多年的卓有成效的统治。

早在后金时期，皇太极就在盛京（今沈阳）接见了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及固始汗的使者。此次西藏使者内地之行，成为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最初接触，并且为后来的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的领属关系打下了基础。皇太极时期，以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为首的黄教深受藏巴汗等人的摧残。为了保护黄教，使黄教在西藏获得更大的发展，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请蒙古固始汗出兵入藏，推翻了第悉藏巴汗地方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当时正是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后金崇德七年），距清王朝入主中原只有两年。此时，西藏的上层人士，包括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及固始汗等人，已经感到清王朝入主中原，改朝换代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求得中央王朝的认可，确立黄教在藏传佛教中的领导地位，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往盛京与后金政权取得联系。1643年，西藏使者肩负重任，从西藏走到盛京，为清王朝与西藏地方正式建立起了联系。

次年，清王朝入主中原，建立起一代中央王朝。顺治帝成为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称帝后，曾专门派人到西藏问候达赖、班禅，并到各大寺熬茶，放布施。达赖、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贺，献土仪。1651年（清顺治八年）顺治皇帝派人到西藏敦请五世达赖前往北京与其会晤。五世达赖接受了敦请，于第二年率众三千人赴京。达赖到京，受到了以顺治皇帝为首的清中央王朝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了皇帝的册封。从此，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并且确立了达赖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此时为1653年（顺治十年）。这次册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清王朝沿用了历代王朝对西藏上层宗教



人士册封的惯例,使宗教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是对黄教及其政权的承认和最大的支持,使黄教有中央王朝作为靠山。另一方面,顺治在册封达赖的同时,也册封了当时握有西藏实权的固始汗,也就顺利地完成了清王朝对西藏主权的延续。从此,西藏地方便牢牢地掌握在清王朝的手中。

康熙末年西藏地区局势不稳,在确定“何人为六世达赖”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稳定局势,加强黄教,康熙皇帝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按照册封达赖之例,赐以金册、金印,其地位与达赖喇嘛同。班禅的册封,一方面确立了他在黄教乃至整个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使西藏有了两个由中央王朝册封的领袖。一方面减弱了达赖的势力,以便于中央王朝对西藏僧俗的统治。清王朝对达赖、班禅的册封,使黄教成为全藏的主要宗教派别,为清王朝的西藏统治和西藏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朝治理西藏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设置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派人领导的、拥有自己军队的、长期驻扎西藏的机构,是历代王朝所没有的创举。驻藏大臣的设置时间,大约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终于清末(1911年),共驻西藏二百余年。驻藏大臣衙门是清王朝驻藏的一个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王朝行使对藏的主权。驻藏大臣更是由皇帝任命,衔在二品的清朝官员,并多由满、蒙官员担任。驻藏大臣的设置,对于更好地治理西藏,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写出《喇嘛说》一文,并刻文立碑。此文除全面地阐述了清王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外,还对大喇嘛转世作了明确规定,那就是著名的“金瓶掣签”制。这一规定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杜绝舞弊、纯洁宗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瓶掣签制,既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改革措施,也是清王朝宗教管理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它的现实作用。

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和祖国领土的完整,清王朝还曾多次出兵西藏,在维系西藏内部的安定、清除宗派势力、反对外来侵略方面作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清王朝在经济、货币等方面也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使整个清代处于一种良性的、符合西藏实际的统治时期,并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安定繁荣局面。

注 释:

[1][2]参见邓锐龄著:《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



## 第二章 支持喇嘛教 利用喇嘛教： 清王朝对西藏的基本国策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有清一代三百年一直奉行支持喇嘛教、扶持黄教的政策。大量庙宇的修建，西藏地区大批喇嘛走向内地，蒙古族对黄教的笃信以及达赖、班禅宗教领袖地位的确立，金奔巴瓶制度的建立等，都是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但从历史上看，清王朝支持喇嘛教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利用它，以期达到安抚西藏僧众、维护统治、巩固边疆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政策是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成功的。

### 第一节 后金政权与西藏的最初接触

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女真族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之后，自立称汗，定国号曰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后金政权的建立成为清王朝的开端，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统治全国近300年的一代封建王朝。“大清”(满文 daicing)国号始于皇太极。1635年，皇太极宣谕废诸申(女真)旧称，改定族名为“满洲”(满文 manju)，并于1636年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是为清朝之始。

后金政权从成立(1616年)到清朝入关(1644年)虽然只存近三十年，但在清王朝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政权伊始，万事开头，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对后来清王朝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努尔哈赤在位虽然只有11年(天命元年、1616年一天命十一年、1626年)，但却先后完成了满文创制、八旗制度、萨尔浒大战、迁都沈阳等一系列大事，为清王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巩固后金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努尔哈赤深感蒙古民众对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蒙古族正处于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转变的重要时期。支持黄教，赢得民心，使众多的蒙古族民众归顺，是后金政权对蒙古以至对西藏的主要政策。



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却接触到了从西藏到蒙古传教的藏族喇嘛<sup>[1]</sup>。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是日,科尔沁老人囊苏喇嘛至。入汗衙门时,汗起身与喇嘛握手相见,并坐大宴之”<sup>[2]</sup>。囊苏喇嘛是到蒙古科尔沁地区传教的西藏喇嘛,曾多次来到辽东,受到努尔哈赤的厚待,成为最早到达后金的藏族喇嘛。囊苏喇嘛在与后金的交往过程中,对辽东地方有了一定的感情,并决定死后葬在后金地方。天命六年(1621年),囊苏喇嘛圆寂,根据他本人的遗愿,努尔哈赤命在辽东城的南门外韩参将的庄园里修庙,安放遗体。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又为囊苏喇嘛修了一座塔,并立碑一通,题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其碑曰:

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苏),乌斯藏人也。诞生佛境。道演真传,既已融通乎大法,复意普渡乎群生。于是,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邦,阐扬圣教,广敷佛惠,凡蠢动含灵之类,咸沾佛性。及到我国,蒙太祖皇帝敬礼师尊,倍常供给。至天命辛酉八月二十一日,法师示寂归西,太祖有敕,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缘累年征伐,未建寿域。今天聪四年,法弟白喇嘛奏请,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乃建宝塔。事竣,镌石以志其胜,谨识。<sup>[3]</sup>

囊苏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西藏喇嘛,死后却受到后金政权的如此厚待,可见努尔哈赤等人对喇嘛教的重视程度。皇太极能够子承父志,在囊苏喇嘛去世九年之后,为其建塔,使我们更看到了后金政权支持喇嘛教的一贯立场。囊苏喇嘛宝塔为藏式喇嘛塔,并有其他一些附属建筑,当地人称“喇嘛塔园”,今无存。其碑原为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现已从喇嘛塔园移到辽宁省辽阳市文管所保存。囊苏喇嘛作为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葬于后金地方的西藏喇嘛,不远万里来到蒙古、辽东地区传教,其促进藏、蒙、满文化交流的业绩,将同那座丰碑一样载入史册。

后金政权时期,对佛教的支持还表现在大修寺庙上。努尔哈赤早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头一年(1615年),就在赫图阿拉“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七大庙”<sup>[4]</sup>。《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亦说:“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sup>[5]</sup>。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太极于崇德三年(1638年)在盛京(今沈阳)建成了后金最大的喇嘛庙实胜寺。据《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记载:





先是，圣上征伐蒙古察哈尔部落时，察哈尔汗畏于威，逃往图白忒部落，至打草滩而卒。至是，察哈尔部咸来归顺。来时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供嘛哈噶喇佛至。圣上命部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三年寺成，名曰实胜寺。东西两侧建立石碑，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sup>[6]</sup>

文中的“帕斯八”又译作“八思巴”(1235—1280年)，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元世祖时被封为国师。他曾用千金铸护法嘛哈噶喇佛，奉祀于五台山上。元被灭亡后，由西藏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又将其移于大元后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成为内蒙古的护法神。当后金征服察哈尔部时，墨尔根喇嘛将佛像移至沈阳，献给后金。这无疑是一种彻底臣服的标志，承认后金政权为内蒙古喇嘛教的保护者。对此，皇太极格外重视，用了三年时间，花了二万余两黄金，建成了实胜寺。此寺为后金时期最大的喇嘛庙，其全称为“莲华净土实胜寺”。据《实胜寺碑文》记载，当时的建筑规模很大，“构大殿五楹，装塑西方佛像三尊，左右列阿难、迦叶、无量寿、莲华生八大菩萨，十八罗汉。绘四恒的喇佛城于棚厂，又陈设尊胜塔、菩萨塔，供佛金华严世界。又有须弥山七宝八物，及金壶、金钟、金银器皿俱全。东西庑各三楹，东藏如来一百八龕托生画像，并诸品经卷，西供嘛哈噶喇。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堂、橱舍、钟鼓音乐之类，悉为之备”<sup>[7]</sup>。此寺今尚存，其主要建筑仍在，当地人俗称“皇寺”或“黄寺”。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听从大喇嘛的建议，在盛京建成了四塔、四庙，象征着四方一统，后金强盛。其东，设东塔和永华寺，有庙宇三十五楹及钟鼓楼、碑亭各两座，并有喇嘛二十人。其西，设西塔和延寿寺，有庙宇四十五楹及钟鼓楼、碑亭各两座，并有喇嘛二十人。其南，设南塔和广济寺，有庙宇四十五楹及钟鼓楼、碑亭各两座，并有喇嘛二十人。其北，设北塔和法轮寺，有庙宇四十二楹及钟鼓楼、碑亭各两座，并有喇嘛二十人。每寺当中有大佛一尊，左右佛两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屠一座。

后金大修寺庙，尊崇佛教，深得人心。那些蒙古僧众纷纷归顺后金，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好回报。尽管后金统治者支持佛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从客观上讲，对于佛教的传播，对于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说，努尔哈赤时期所崇尚的佛教还带有汉地佛教色彩的